

## 第三章 打好三个桩子

### 打好组织桩子

海军创建伊始，中央、军委就一再指示我们：海军建设要注意打好基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在海军首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把这个打基础的工作，比喻成是要注意打好三个桩子：一是组织桩子，二是政治思想桩子，三是技术桩子。

上述三个方面的基础建设，既概括了当时所做的大量实际工作，又是从海军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着眼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步走得越扎实，以后的步伐就会迈得更快。我把它们比喻成打桩子，就是强调要把第一步走好，把基础打牢。这样，以后的建设就可能不走或少走弯路。

打好组织桩子，在当时主要是搭架子，铺摊子，把各级和各方面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

整个海军建设是一盘棋。组织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不能不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当时盘踞在敌占岛屿上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经常对我苏南、浙江、福建沿海进行袭扰和破坏。面对这种形势，我海军建设的重点，自然要首先放在华东前线。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首先组建起华东军区海军，就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在我一九五〇年初调到海军时，华东军区海军不仅有了个领导机关，还有了几个舰艇编队、一所海军学校。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的军舰、飞机在朝鲜战场上耀武扬威，我黄海、渤海也成了海防斗争的前线。而我国北方的第一大港青岛，当时又是个几乎没有设防的城市。保卫黄海、渤海，保卫山东半岛，保卫首都，成了海军建设最紧迫的任务。华东前线的战略地位固然仍很重要，但是海军的战略重点却又不能不移向北部海域。这样，我当时的工作重点，也就放到了青岛基地的组建和山东半岛的防务上。

由于旅顺口还驻扎着苏联军队等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在青岛组建军区海军的条件尚不成熟，我们研究确定，先把基地搞起来。这个基地是归华东军区海军领导好，还是由军委海司直接管辖好，我就这个问题广泛征求了意见。同苏联顾问商量过，还当面征求了当时任华东军区第一副司令的粟裕同志的意见。考虑到青岛地理位置重要，对保卫华北和首都战略意义大，同时青岛离江浙地区较远，由

华东海军领导有很多困难，一致同意由军委海司直接管辖为好。我就这个问题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代总长写了报告。毛主席批示：“肖劲光同志，同意你的提议。”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我偕同海军总顾问库兹敏第一次到青岛，去实地察看港口和海防设施，着手筹建基地机构。到青岛以后，为了不给当地政府增加麻烦，我们一行借住了一所小房子，晚上就睡在地板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里不仅港湾良好，码头、仓库等大的建筑没有遭到战火的破坏，而且过去日本人、国民党海军修建的一些设施，如水上跑道、海军电台、医院、学校、兵营等，虽说简陋，但大多数都还可以使用。我当时计算了一下：利用这些设施，不仅可以把基地领导机关的摊子搞起来，还可以在这里因陋就简地把我们要急于成立的鱼雷快艇、航空兵、岸炮等几所学校办起来。经报告周总理决定，青岛地区凡属海军的一切建筑、设施，一概归海军接收。这使我非常高兴。青岛一共有六个码头，经与地方研究确定，将三号码头列为海军专用码头，四、五号为公用码头，其余均为商用码头。还有座落在汇泉湾附近的那座叫“东海饭店”的高层建筑，青岛解放后由国家铁道部门的一个单位接管。当时铁道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开始不大想让出来。我说：“这座楼房原是旧海军的，理应归我们接管。”事情也闹到了周总理那里，最后还是给了海军。

我们一行，还到烟台和威海地区去进行了察看。烟台除了有一个渔船码头、在烟台山有几座房子以外，别的海军设施一点也没有。威海也是一样，什么设施也没有。到了刘公岛，这个昔日北洋水师曾在这里练武，闹得热火朝天的地方，如今却冷冷清清。我只是看到了几门古炮和几座象庙宇一样的房屋。

当时已到达青岛地区的部队，只有原四野后勤二分部和十二兵团直属队的一些机构，共约四千人。我们就以这些机构和部队为基础，着手筹建青岛基地和几所学校。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宣布成立基地筹备委员会，以当时任青岛警备区司令员的赵一萍同志为主主任，以四野后勤二分部政委许培仁同志为副主任。

回到北京，我于五月十六日，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罗荣桓等中央和军委总部的领导同志写信，报告了我察看青岛地区的情况和筹建基地的设想。我在报告中说：“青岛是商港，同时又是华北最重要的军港。……青岛海港的各种设备，如码头、仓库等，基本上未遭破坏，且较优良，但是海防可说没有，海上全无屏障”。我建议尽快组建基地和几所学校，并附上了当时拟制的青岛地区海防计划、组建基地和几所学校的组织系统表和编制表。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各项筹备工作迅速展开。组建基地的人员除来自原先已抵达青岛的四野部分机构以外，军

委又调来了二野第十一军直属队和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三总队。在各地党政军的支持下，几所学校抽调教员和学员的工作，也进展得很快。九月九日，军委发布命令，宣布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与此同时，设在青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学校、炮兵学校、鱼雷快艇学校也陆续开学。

九月上旬，我又第二次到了青岛，了解基地和几所学校的筹建情况，共同研究和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二十五日，召开了一次青岛地区海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除了赞扬筹委会几个月来的辛勤努力，提出了当时要抓紧做好的几项工作，还正式宣布了经军委批准任命的基地和各校负责同志的名单。基地司令员易耀彩、政治委员段德彰、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赵一萍、第二副司令员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副主任胥治中；航空学校政治委员桂绍彬（随后又任命了校长赵汇川）；炮兵学校校长王效明、政治委员宋景华；鱼雷快艇学校校长邓兆祥、政治委员朱军。

在广州地区，华南局和广东军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也将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和我军在广东、广西收缴、购买的一些军用舰船，组成了一支江防部队，成立了江防司令部，由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兼任司令员。随着华南沿海海区的扩大和海防任务的加重，由江防司令部这样一个机构来组织领导，就显得不相适应了。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洪学智同志给我来电提出：“原江防干部及机

构很不健全，不能担任现任务……江防工作要我兼管，实际上是兼而不管，长此不是办法”，并建议海军研究解决“广东建设什么性质的海军，如何组织”的问题。这样，加强和组建华南地区海军的任务，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向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迅速成立华南海军司令部。报告中说：“鉴于中南区之海南岛业已解放，所属各港湾，如榆林、海口、珠江口、黄埔等急需统一管理，防止破坏，并逐步地进行恢复与建设工作。”“中南区海岸线甚为辽阔，北起汕头，南及西沙群岛；还有江河，地形复杂，土匪、特务、海盗利用我不设防的空隙，肆意骚扰，因此，统一沿海与江河水防务和剿匪，亦是迫切的任务。”这以后，我们还把建立华南海军领导机构的意见电告了中南军区领导，并向当时任华南局书记的叶剑英同志征求了意见，得到了军队和地方领导的一致支持。几个月后，军委正式致电中南军区领导，责成他们负责组建华南海军。电文中指出：“根据中央海司与叶剑英同志共同研究结果，认为华南海军主要任务有二：第一，保卫华南领海；第二，准备协助解放台湾作战。”军委还决定，抽调原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四军军长的方强同志来负责华南海军的组建任务。在命令没有下达以前，方强就来到北京，参加了海军建军会议。会上就华南海军的防区、任务和组建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不久，军委又决定由中南军区抽调四野第五十八军第一七三师和四野补训二

师，加强华南海军的组建。十一月二日，军委电令，华南地区海军领导机构成立，正式番号为中南军区海军。方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仁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吴琨任政治部主任。

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等领导机构组成以后，即着手组建基地以下部队的领导机构。这里首先碰到的就是海军组织系统的体制问题。海军兵种复杂，任务繁多，不象陆军部队那样，可以按照军、师、团、营、连的体制来组成。经过与多方磋商，并参照苏联海军的体制，当时确定团以上机关分为海军、军区海军、基地、水警区、巡防区这样五级。基地机构，除青岛基地直属海军领导以外，最先成立、由军区海军直接领导的只有一个舟山基地。这是因为舟山地处浙东前线，部队多，任务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较高的领导机构来统一指挥各个部队。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淞沪、威海、福建、湛江等基地。最先成立的水警区也不多，只有青岛、塘沽、万山、吴淞、温州、厦门等。最先成立的巡防区则有万山、烟台、威海、青岛、连云港、嵊泗、温台、沙埕、汕头、虎门、北海、琼东、西营、琼西、海口等。这些巡防区以后有的被撤销，有的升格为水警区。

在组建上述各级领导机构的同时，我们还着重抓了各个兵种部队的建设。这里也遇到了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是各兵种先后依次建设好呢，还是全面展开，同时建设好？

显然，依次建设时间拖得很长，不适应海上斗争的紧迫需要；各兵种全面展开建设，则又限于许多条件不具备，有的兵种一时搞不起来。最后，海军党委常委研究确定，采取全面展开、重点建设的办法，急需而又具备了基本条件的先搞，各个时期各有所侧重。这样，最先开始搞起来的就只有水面舰艇中的护卫、登陆舰艇部队，鱼雷艇部队以及岸炮部队。例如，华东军区海军于一九四九年底就利用那批起义、投诚过来的水面舰艇，组建起了第五、第六、第七舰队（以后改称支队）。随后，中南军区海军也组成了第一舰队。在鱼雷快艇学校学员经过一年多培训的基础上，海军于一九五一年九月组建了四个快艇支队，分别拨归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及青岛基地建制领导。各地区还抓紧了岸炮部队的建设。一九五〇年十月，在青岛地区组建了第一个海岸炮兵营。随后，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领导机关均先后设立了岸防兵部，并积极领导民工、军工，抢修海岸炮兵阵地。到一九五二年冬，各处阵地上已安装了各型大炮近百门。

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的军种，可以担负起海空的全部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什么航空兵。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嘛。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舰艇在海上如果不能随时得到自己空军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而要学习世界上那些海军强国。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要建立的是一支足以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的海军，不能没有航空兵这个兵种。苏联顾问赞成这种意见。中央军委也支持这种意见。为了密切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关系，便于协同作战，军委还明确规定：“协同陆军部队作战是空军最根本的任务，在近海地区还得协助海军保卫我国的海防。”

航空兵的组建也是从办学校开始的。青岛海军航空学校，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利用从苏联进口的几十架不同型号的飞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培养出了一批空、地勤技术人员。有一次，我和苏联派来的一位叫扎哈洛夫的全权军事代表，在周总理那里一起讨论海军的建设问题，当即确定要抓紧把航空兵搞起来，以防止帝国主义进攻我国。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我给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并聂代总长呈送了《一九五二年海军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尽快组建航空兵的领导机构和部队。毛主席、周副主席批示同意从空军陆续抽调几个驱逐机师给海军，并把沿海几个固定的机场拨给海军。我们还造了向苏联购买三百四十三架飞机的预算，周总理批了二百三十二架，批语上写着：“拟同意海军的空军顾问所提出的海军的军建设方针，并请牟兴同志（苏联顾问）回国后，先向其海军当局试谈一下，看他们在原来帮我们的海军三年计划外，可否再送一批空军器材。”这个报告又经毛主席批示：“照

周批办。”这年四月，海军航空部成立，曾克林任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命顿星云为司令员。六月，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成立，曾克林兼任师长。从此，海军航空兵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部队。

随着兵种的增多和专业分工的严密，海军领导机关原先按照陆军只设立司、政、后、卫四大部的组织形式，也越来越显得与海军建设的特点和要求不相适应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海军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编制座谈会。在这年年底召开的海军首长会议上，也就组织编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参照苏联海军领导机关的编制体制，决定按照海军专业分工的性质与任务，改变原有组织结构，使之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基本的组织原则是：纵深缩短，横宽伸张，人员精简，效率提高。这样，海军领导机关就陆续增设了不少业务部门，如修造部、工程部、岸防部、航空部、军校部、干部部、直属政治部、财务部，等等。最多时曾经达到十多个大部。与此相适应，各军区海军，以至各基地的业务部门也都有了增加。当然，后来的实践证明，分工过细，也不利于集中统一领导，有些业务部门就陆续撤销或合并了。

由于各地海军多是在沿海军区的领导和关怀下组建起来的、海军领导机关成立较晚、与各地海军又相距很远等多方面的原因，各地海军对当地军区与对军委海军，就产生了一个是什么样的领导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明确，

沿海军区和海军不便于实施领导和指挥，各地海军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必然影响工作。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随后并提请军委考虑决定。军委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下达了《关于海军领导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各个战略地区的海军，对各大军区与对军委海军司令部就被确定为双重领导关系。各大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海司主要为建制领导关系”。《决定》中并就各大军区与军委海司对各地海军之领导与管理工作范围，作了具体规定。这样一来，海军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了加强，各大军区的职责也明确了，大家都比较满意。

打好组织桩子，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贯彻落实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问题。首先，就是要在海军的所有部队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保证一切工作都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组织各级领导机关和各个部队的同时，各级党的委员会也都同时建立起来了。“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实行的组织制度。海军基层单位的党支部应建立在哪一级呢？由于部队情况不同于陆军，我们也就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例如，舰艇部队，舰上一般都建立了支部，小艇由于党员太少，支部就只能建在中队；飞行部队，一个中队的党员也很少，党支部就只能建立在飞行大队；至于观通部队，有的观通站党员也不多，但由于长期远离领导，单独执行任务，那怕只有几个党员，一般也都建立起了党支部。为了保证党支部有个核心领导人物，

各舰和艇中队普遍配备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在建立党支部的基层单位，还普遍成立了革命军人委员会，以后还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建立起了这些组织，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领导部队完成各项任务，也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其次，在建立和健全各级组织机构的时候，还要不断充实来自陆军的干部战士、青年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原海军人员等各种力量，并把他们安排到适当岗位。在这方面，中央军委和各大军区、各地党政机关、各地方院校都给了海军以有力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从二野、四野抽调了大批领导干部和部分机构，组成了海军领导机关和中南海军、青岛基地，我这里要着重提一下三野和华东军区。从他们那里抽调了两三个军的架子来组建华东军区海军，选调了张爱萍、袁也烈、赵启民、康志强、傅继泽、饶守坤等一大批优秀干部，到华东海军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到华东军区去会见陈毅同志，感谢他们对组建海军的热情支持。他把支援组建海军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情，连忙摆手说：“不要谢，责无旁贷嘛！”为了真正做到“以工农为骨干”，我们还通过总政，从陆军各部队选调了三百名战斗英雄，充实到海军部队。仅一九五〇年，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各大军区为海军院校输送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农学员，就有六千余人。

按照国务院和军委的安排，地方院校陆续给海军输送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使海军部队不断增添新鲜血液。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邀请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商谈决定，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和部分工人进军事院校。海军院校当年就招收学员两千人；第二年又招收了一批。对于领导机关的干部，我们也比较重视物色一些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思想理论水平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例如，我们报告总政，把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过的李君彦、边疆同志调来海军政治部，分别担任了宣传部长和组织部副部长。我还几次给罗荣桓主任打电话，从东北某炮兵部队，把抗战前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林真调来海军，担任了舰船修造部部长。

至于原海军人员，除了成建制地起义、投诚过来的以外，我们曾想尽一切办法，把散落在各地的原海军人员都征集起来，量才录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中央军委为这件事曾电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电文中说：“查原海军人员流散各地尚属不少，有的已转业于商船海关，或任教于一般学校，或服务其他机关，有的则流散各地，生活无依”。“中央责成各地党政民学机关及各战略区，设法清理登记，调选搜罗这些人才。凡无政治问题，身体尚健，而有一技之长者，尽可能抽调出来”。“以克服新海军建设中人才的困难”。与此同时，各战略区海军运用

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个别查找等方式，也征集到一批原海军人员。总人数曾达到三四千人。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一般都做到了用其所长，使之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海军建设服务。当时大多数原海军人员，被分配到舰艇部队，一部分被分配到学校任教，也有少数人被分配到机关技术部门工作。

原海军人员中，除了一大批基层军官和士兵以外，还有几十名高级军官，其中大多数都在华东海军。如何团结这支力量，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呢？在我到海军前，华东海军已经把他们初步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把他们调来北京，再把中南和其他地区的原海军高级军官都集中起来，有近二十人，成立了海军研究委员会。正、副主任从他们中选任，我们派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去任秘书长。

我对这批原海军高级军官的情况，逐个进行了调查摸底。被委任为海军研究委员会主任的曾一鼎，是英国海军大学毕业的，中将军衔，曾任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员、江防舰队副总司令、海军参谋长。副主任郭寿生，毕业于烟台海校，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我党，一九四九年对推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曾起过重要作用。其他委员也大都有较高的学历，在国民党海军中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有的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武官，有的担任过海军司令部的处长、课长，有的担任过舰队司令，有的担任过报纸

的总编辑，有的长期担任江南造船所的副所长。当时我想，团结教育改造这批人员，不但是贯彻海军组织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海军建设将会起一定的作用，而且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实际工作。这些人当时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在生活上我们给了他们较优厚的待遇，每月工资多的二百多元，少的也有近二百元。

有的同志说：“研究委员会成了海军首长的第二顾问团”。这话虽不很确切，但是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海军和国民党海军的问题，的确是常常向他们询问、要他们整理材料。在十多年中，他们翻译、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如《美国海军学校海军战术教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诸战役》、《美国的兵力编成与战略部署》、《英美海军参考资料》、《外国海军资料》，等等。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外国海军的情况，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九五二年有一次，毛主席为了分析当时朝鲜战争的发展形势，要我在两天之内给他提供一份资料，其内容是：美国海军从本土运输一个兵团和一个军的兵力到横滨、南朝鲜、越南、香港，各需多少舰船？多长时间？还需要多少舰艇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资料，当时驻海军的苏联顾问一下子是回答不上来的。我只得把这项任务布置给了研究委员会的刘隽等委员。刘隽曾在美同参谋大学学习过多年。他们加班加点，查阅资料，计算核对数字，按时把资料拿出来了，我把它送给了毛主席。

后来还有一次，毛主席要我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数字：中、日双方的兵力各有多少？日寇侵华的战略纵深是多少？苏、德双方的兵力各有多少？德军侵苏的战略纵深是多少？我也是找了几个研究委员，才把这些数字计算出来。

## 打好政治思想桩子

根据毛主席着重政治建军的思想，我们在抓紧组织建设的同时，也重视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而且把这方面的建设提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我在一次会议上解释打好三个桩子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过：

“要奠定海军建设的基础，必须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打好三个桩子，特别首先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桩子。这个桩子如果不打巩固，就不可能在统一的意志下进行工作，党的建军路线、方针和任务，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执行，组织建设、技术建设也就没有保证。”

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以后，便重视了部队政治思想情况的调查分析。机关干部下部队调查，海军领导干部也重视运用各种方式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除了掌握面上的情况，还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对长沙、济南、广州、临沂、兴国、吉田等战斗舰艇的部队思想情况，进行了典型调查。一九五〇年五月间，海军几位领导同志在一起，对部队政治思

想情况进行了第一次分析；接着在八月海军建军会议上，又就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当时部队思想上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团结问题。组建海军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各大军区，有的来自别的军兵种，有的来自地方院校，有的来自原海军。各个部队之间、上下之间、新老之间、中国人与苏联专家之间，都难免产生矛盾。其中从陆军来的“新海军”与原海军人员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有些原海军人员由于自己有文化、懂技术，瞧不起从陆军来的“大老粗”；有的埋怨党组织和工农出身的同志不信任他们，而那些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又受到讽刺。有些来自陆军的同志则因为自己经过战斗考验，觉得“打仗还得靠我们”，原海军人员是“手下败将”，没什么了不起。当时舰上的舰长差不多都是原海军人员担任，政委和副舰长则是来自陆军的干部。有的军舰竟闹到战士看见舰长不敬礼，舰长和政委互不讲话，舰长和副舰长动手打架的地步。针对这种情况，我和海军其他领导同志几乎每次会议、每到一处，都要突出强调搞好各方面的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能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来搞好海军建设。在青岛基地成立的那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我就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我当时说：“团结出了问题，谁负责？我看上级要对下级负责，党员要向群众负责，军队要向地方负责，老的要向新的负责，中国人要向外国人负责。当然，每个

人自己也要负责，要作自我批评。”

另一个是事业心问题。从陆军来的同志绝大部分工作不安心，认为调来干海军是“逼上梁山拖下水”。有的说：“舰艇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海岛上也是抬头见天，低头见水，海军生活太单调了！”有的说：“海军靠技术吃饭，这个饭碗咱端不了！”还有的说：“干海军，个人发展慢，不如干陆军，打一仗可以连升几级。”思想包袱比较重的，工作提不起劲来，一再写报告要求调出海军；思想包袱轻一些的，则由于当时上级号召要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怕别人说自己贪生怕死，暂时没要求调动，思想上却盘算着“打下台湾再说”。总之，愿意干海军，扑下身子来想为海军干一番事业的人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办法是大力加强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记得当时为了激励部队树立热爱海洋、长期为海军建设事业奋斗的思想，我们曾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例如：“守卫海洋国土，是我们最神圣的任务”，“要做海上主人，不做海洋奴隶”，“热爱海洋，征服海洋”，“把荒岛建成乐园”，“把岛屿变成国防堡垒”，“以海洋为家、以舰艇为家、以海岸和岛屿为家”，等等。应该说，这些口号直到今天，对海军广大指战员来说，仍然有着巨大鼓舞作用。当然，在着重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各级领导也注意了尽可能解决部队的一些实际问题，不断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

一九五一年八月六日至二十六日，海军在青岛召开了

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海军和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的领导干部以外，还有部分舰艇、大队、巡防区、岸炮团的政工干部，共一百一十余人。一些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例如：怎样做好舰艇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怎样做好海岸和岛屿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怎样做好剿匪、护渔、扫雷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怎样做好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等等。刘道生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讲话。他着重从加强组织建设、加强思想建设和保证技术学习三个方面，论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了“政治工作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海军建设任务的实现，部署了为加强政治思想建设要认真抓好的大量实际工作；要求各部队大力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坚持舰艇建立党支部，舰艇设政治委员等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同时，要重视海军技术装备复杂的特点，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技术业务工作中去。雷永通同志就整党建党问题作了报告，到会同志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我在会上也讲了话，着重阐述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和建军路线，提出“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应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我解释说：“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海军，这一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依靠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各级领导机关、

各业务部门、各兵种和各学校虽有具体任务的不同，但必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个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这应成为我们一切工作领导上的中心思想和我们一切工作共同围绕的重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自觉地积极地有步骤地有配合地进行工作。否则，我们的工作就会是盲目的、零乱的、没组织的，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财，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建设海上战斗力量这一中心任务。”怎样才能胜利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呢？除了要认真贯彻落实海军的建设方针和建军路线以外，我提出了一个“要以新的工作态度对待新的事物”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在很多地方还泥守着过去带兵的那一套老办法。工作方式方法是一揽子的，而技术和知识水平大部分还没有脱出“小米加步枪”的阶段。我们的司令机关依然在按照陆军一套陈规办事，很多新的业务还迟迟未能很好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政治工作虽然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研究海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创造适合与海军部队要求的新的工作方式方法上，则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后勤工作，在很多方面远远不能适应海军建设的新的要求，还是在拿过去在山沟里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方法管理现在的大工厂，以管理小米的方法管理油料，以管理步枪的方法管理现代化武器。这类做法给我们工作上和资财上造成很大损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旧的工作方式方法与新

事物的发展发生了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把那些已经不适用的旧的方法加以改变。因此，我在会议上提出：“我们不能再照老样子干下去了！我们必须用新的工作姿态对待新事物，创造出一套适合于新事物发展的新方法。至于怎样才能树立新的工作态度？我认为：基本问题在于学习，在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

在讲话中，我还谈到了建设人民海军必须树立起一种基本思想，这就是“在人民群众中生根的思想”。我们海军的任务是巩固和保卫海防，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作战中，必须依靠海岸和岛屿，不论航空兵、舰艇和炮兵，都不可能离开海岸来建设，也不可能离开海岸的供应和支援来作战。只有依靠海岸和岛屿，才能发挥我们的优势。而依靠岛、岸，首先就是依靠岛、岸的人民群众。岛、岸人民群众是构成海岸防御的重大的力量，海军只有在岛、岸人民群众中生根，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在讲话中要求各部队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海军各部队中，把这个思想明确地树立起来。

这次会议开得是很好的。可以说，它是继一九五〇年八月，海军建军会议之后的又一次对海军建设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它所总结的人民海军建设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继承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东西，却具有适

用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特点，为进一步创造海军建设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认真讨论和确定了今后海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指导思想明确了和统一了，实际工作也就有了方向。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总政的指示，还部署了海军的整党建党工作。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情。历史经验证明，革命的发展和胜利，首先就要依靠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把海军的党组织整顿好和建设好，就解决了人民海军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在为会议致闭幕词时，概述了这次会议取得的上述重要收获，并明确指出：“会议闭幕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拿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如何把我们新的经验，在我们的新的建设事业中去普及提高。”

朱德总司令、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朱德同志说：中国过去的海军是防内不防外，封建势力的海军，蒋介石的海军，都是这样。我们建立海军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任务很重。我们的海岸线很长，要保卫海防，首先要靠海军。还有陆军、空军，配合你们，共同完成保卫海防的任务。现在我们海军的力量还很小很小，但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是从小开始发展起来的。你们才搞了两年，已经有了成绩。我很高兴，回去还要报告毛主席。在谈到政治工作的作用时，他强调说：政治工作主要应起保证作用。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保证现代化的技术学习。罗荣桓同志说：海军这次政治工作会议对许多问题讨论得比较充分，思想上有了统一的认识，相信海军的政治工作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他还说：海军提出“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作为建军路线，是正确的，已得到总政的批准。希望能把它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现在海军中的骨干大都是从陆军调来的，要这些骨干从在陆军发挥作用转到海上发挥作用，就要重新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技术，熟悉海上生活。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这些运动，规模大，范围广，一般都要持续几个月以上。有些运动，例如，镇反、“三反”运动，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总政的统一部署，在海军部队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通过这些运动，海军部队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比如，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挖掉了内部的隐患，纯洁了部队，提高了革命警惕；经过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不仅查清了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清除了旧社会的流毒，而且挽救了一些干部，教育了全体指战员。还有些运动，由于主要是在军队以外的范围内进行的，我们部队主要是配合这些运动，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教育。除经常性的时事政策教育以外，主要有：土

地改革教育、抗美援朝教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等。经过这些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提高了政策思想水平，激发了部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海军建设服务的革命积极性。可以说，这些社会改造和教育运动，是海军创建时期政治思想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为海军部队打下政治思想这根桩子，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各部队还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做好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开展立功创模运动便是很得力的一项。这项活动开展得很普遍，很有成效，对继承和发扬我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广大指战员为海军建功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方面，我经常回忆起一九五〇年冬天我访问苏联，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时的感受。那个博物馆里，用各种形式展示出十多个大的战役的情景，其中主要的部分是大批英雄的照片、事迹、模型、奖品和烈士遗物。如有一个模型是：当德机轰炸莫斯科时，一个苏联的空军英雄在子弹打完后，以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将德机尾巴截断，结果飞机坠地焚毁，德寇毙命，而苏联空军英雄的飞机虽也坠落，人还活着。博物馆里对苏联海军的英雄事迹也有许多记载，几乎每艘军舰、每架飞机都有光荣的战史。例如，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一架海军驱逐机，这架飞机曾打毁敌机三十余架。我当时看了，很受鼓舞，联想到我们海军，也有许多英雄模范

事迹，如解放万山群岛、解放嵊泗和披山岛等战斗中，都涌现出许多功臣和英雄人物。在海上训练和执行巡逻、护渔、护航等任务中，也有许多感人的事迹。我觉得，用这种宣传具体典型事例的方法对部队进行教育，比单纯的讲道理，效果将会好得多。在海军召开的首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参观苏联英雄事迹展览时的感受，提出了要多进行形象化教育的意见。以后在一些场合，我又多次讲了这个意见。

各部队的立功创模活动开展以后，果然涌现出了许多功臣和英雄人物，各级领导机关便采用举办展览、召开英模代表大会等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指战员扎根舰艇、岛屿，建设人民海军的积极性。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我到广州出席了中南海军召开的英模代表大会。在讲话中，我勉励中南海军的广大指战员，要更高地举起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为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保卫华南的海疆，为解放台湾，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九五三年初，海军也在北京召开了首届英模代表会议，会上大力表彰了十个先进单位和四十八名英模代表的先进事迹。朱德总司令又到会讲话，勉励大家“必须加紧训练，努力工作，团结沿海渔民，长期地、勇敢地、大胆地担负起祖国海防的神圣任务”。他还为大会题词：“高举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建设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把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歼灭在海洋。”

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亲临海军部队视察，对广大指战

员为建设强大海军努力奋斗，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以外，这里我只着重提一下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毛主席对海军舰艇部队的首次视察。毛主席登上“长江”、“洛阳”等舰艇，同舰员们一起航行，一起生活。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思想工作。它表明中央、军委对海军建设的重视和关怀。在视察中，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水兵们说：“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很显然，毛主席是在教育我们要树立建设海军的坚强事业心。他还说：“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这是在教育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守海防。他四次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进一步为海军建设指明方向。

作风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部队的精神面貌。它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推动或者阻碍各项任务的完成。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很重视培养良好的海上战斗和生活作风，并把它同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针对海军部队的特点，我们当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要特别重视树立和发扬以下五种良好作风：英勇顽强、克服困难的作风；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作风；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作风；爱护舰艇、爱护武器的作风；联系群众、爱护群众的作风。各部队培养这些作风，一般都做到了紧

密结合战斗、训练和各项勤务活动进行，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了，爱护武器、关心集体、关心群众的好人好事不断增多，以艰苦为荣、以助人为乐等良好的风气也逐步形成。

结合当时开展的“三反”运动，我们还着重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我们对各级领导机关提出要“面向海洋、面向舰艇、面向海岸和岛屿”，一切工作都要为舰艇和海岸、岛屿部队服务，为基层着想。当然，要把口号变成行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部队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反映出当时海军和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是相当严重的。

一九五二年八、九月间，我们抽调海直机关的部、处、科长等六十多名干部，分赴华东、中南、青岛各地，用四十多天时间进行了一次工作检查。在检查中，发现许多工作并没有很好落实。不安心舰艇和岛屿部队工作的情绪没有完全克服，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组织机构仍不健全，一些工作没人过问；军事训练有的抓得不紧，有的初步掌握了一些技术就自满起来；舰艇和岛屿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困难，等等。部队存在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作风不深入、不踏实。有的对下情很不了解，有的了解了也听之任之，有的对严重情况也熟视无睹，有的忙于开会、发文件，有计划缺乏督促检查，上动下不动。

我把部队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检查情况，如实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看了很重视，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报告转发给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军委各部门。电文中这样写道：“海军司令部肖劲光同志的这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揭发了存在于领导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工作不深入和下层存在的许多问题未能获得解决的严重现象”。“类此现象，在各兵种和各级领导机关中，虽然程度不一，但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问题”。“特要求各兵种和各级领导机关，也象海军司令部那样，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了解部队真实情况”。

在检查出部队存在这么多严重问题以后，我们立即要求华东、中南海军和青岛基地领导机关，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帮助部队解决存在的问题。海军几位领导同志也分头到各地去进行督促检查，有的到了华东海军，有的到了青岛基地。在这以后的三个多月中，各地都派出了百人以上的工作组，深入舰艇、岛屿、机场、岸炮、仓库，一面继续检查发现问题，一面就地帮助解决问题。通过这样一次前后持续近半年的大检查，不仅解决了部队存在的一大批实际问题，如不少地方建立了供应站，一些岛屿部队有了交通船，一些部队修建了营房，舰艇伙食有了改进，宣传文化器材、学校教育设备得到补充，等等，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领导作风的改进，许多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了克服。

## 打好技术桩子

有人曾经问我：“你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打好三个桩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有人要摇桩子，所以我就强调要打！”事实上，对于要打好组织桩子、政治思想桩子，大家的意见还是一致的，没有多大分歧。但是，强调要打好技术桩子，认识和行动就不那么一致了。有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把技术也说成是一根桩子，并且把它同组织桩子、政治思想桩子并列起来。他们认为，这样说是否把技术的重要性强调得过分了？他们要摇的主要就是这根桩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热衷于“突出政治”的人，给我扣上“一贯坚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主要也是责难我过于重视军事训练，重视练好技术。今天，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对于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了。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这却是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来问题并不复杂，越争论却使人越糊涂。今天，在回顾历史时，我觉得还有必要说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的确，单就最初的两年来说，我强调要学好技术的讲话就够多的了。一九五〇年四月，我在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和第一次在大连海校讲话时，都反复强调，干海军就要努

力学习海军技术业务，掌握海军技术业务，精通海军技术业务。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海军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上，我说：我们海军“从一艘舰艇，一座海岸炮，一架飞机，到整个军事指挥系统和物资供应系统，都是按照高度的技术分工和业务分工组织起来的。人被技术所组织所分配，人要指挥技术，人就必须精通技术。”十月，在南京联合海校讲话时，我又说：“今天海军建设是干部决定一切，决定干部的因素是技术。海军是高度的技术兵种，必须有掌握技术的人员，必须有很好懂得技术的干部，要按照技术的规律运用技术”。“我们一旦掌握了技术，就会使我们人的素质提高一步”。十二月，在海军首长会议上，我还说：“我们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对海军不内行”，“今天，干部能否掌握技术，已成为能否实行建军路线，能否建设海军的中心的一环，也是来自解放军的老同志能否成为建设核心的关键”。

海军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以及军区海军的一些领导同志，那时也都很重视技术学习，强调学好技术对建设海军的重要作用。有的指出：“保证学好技术，是海军中的党和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和战士的最光荣的头等任务”。有的还撰文写道：“海军是技术部队：它的武器是技术的，装备是技术的。战斗依靠技术，一切行动都依靠技术。没有科学技术，就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海军。没有熟练技术人员来掌握科学技术，就没有海军的战斗力。”

当然，对于技术的位置也要摆得适当，特别是对技术和政治的关系，要处理得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也是站得住脚的。我在强调技术重要的同时，总是强调：“政治是主导，技术是从属；政治是目的，技术是手段”。“我们建设一支海军，是为着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即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学习技术是为达到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另一方面，我也讲：“技术可以发挥政治的力量”，“人的力量与作用，政治的力量与作用，要通过技术业务才能发挥出来”。“把政治和技术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觉得，只有这样讲，才比较全面，又分清了主次。

在实际工作中，在处理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关系时，我们当时突出强调了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要求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要把领导和保证技术学习当作经常的中心任务，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技术业务学习中去，保证技术训练的顺利进行。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大量现实思想问题，例如不安心海军工作、事业心不强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懂技术引起的。学好了技术，一些思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离开技术业务来做政治思想工作，就必然脱离实际，流于空谈，一些现实思想也就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保证，技术训练必然难以顺利进行，更谈不上取得显著成绩。为了做好技术业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还强调政工干部也必须学习一些技术业务，以便更好地掌握技

术业务的规律，及时发现和解决技术业务训练中的问题。

我们当时这样强调要学好技术，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而是出于建设海军的迫切需要，出于对海军建设事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试想，有了舰艇开不动，有了火炮打不响，有了飞机上不了天，我这个海军司令员心里好受得了吗？每次下部队看到这种情景，听到舰艇碰撞、搁浅，火炮机械损坏等事故不断发生，真是心焦如焚啊！当然，从海军建设的长远目标来说，凡是具有起码海军知识、愿意看到海军强大起来的人，都不会看不到掌握科学技术有何等重要！因此，不管别人怎么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厌其烦地强调技术这根桩子也要打牢。

创办各类学校是培养技术人才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措施。继最初创办的大连海校、联合海校、航空学校、炮兵学校、鱼雷快艇学校之后，海军又陆续创办了政治干部学校、后勤学校、潜艇学校，并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设立了海军系、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了海军工程系。原有的大连海校分成了指挥、机械两所学校。联合海校下设有兵器、机械、通信和舰务四所分校。航空学校也分成了第一、第二两所航校。这些学校，除了少数负责培养政工、后勤业务干部和高、中级指挥人员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培养的基层各类技术干部、军士和水兵。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有一万五千多人。他们对于各自需要掌握的海军技术，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

习。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分配到了各个部队、各个战斗岗位。

为了使更多的人人都能初步地掌握一两门急需的技术，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在两三年之内都分别举办了几十期短期训练班，用原海军人员当教员，或由苏联专家授课，学习轮机、航海、枪炮、电工、雷达、通讯等几十种专业，轮训的人员数以万计。这一措施，对于在技术上培养工农骨干，提高部队的专业技术水平，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能够进学校和短训班学习的人员毕竟还是少数，对大多数干部战士来说，都是要坚持在职学习。这是当时解决技术问题的一种主要方式。于是，各部队普遍掀起了一个突击学习技术的热潮。许多同志废寝忘食，学习得非常刻苦。学习中，一般都是采用“用什么，学什么，先学一门，再学别样”，“由浅入深，由近及远”，“边教边学，边学边练”等方法，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初步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应用技术。

在学习中，我们及时发现和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保证了技术学习的健康发展。例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我们发现，战士的技术水平普遍有了明显提高，不少工农出身的战士在技术上迅速赶上和超过了原海军人员中水兵的水平。但是，在干部中，除少数同志学习成绩比较突出以外，一般的都没有掌握自己应该掌握的技术。技术学习出现了“干部落后于战士”的严重情况。检查其原因，

一是由于干部的日常工作过于繁重，什么工作都需要干部亲自过问，什么问题都要经过多方的研究，干部经常沉浸在冗长的会议中，拿不出多少时间来学习技术；二是有些干部在学习态度上还放不下架子，不能象战士一样的勤学苦练；三是领导上对干部技术学习抓得不紧，更缺少督促检查，干部技术学习往往出现自流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海军是技术部队，干部不仅是技术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同时还是技术的操纵者和管理者，主要的武器装备，都掌握在干部手中，而不在战士手中。许多战士只管理次要的技术和在技术上作干部的助手。如果只有掌握技术的战士，而没有熟练掌握技术的干部，那就等于没有技术。何况战士需要的技术，到底是简单些，容易提高，而干部需要的技术更为复杂，掌握起来更为困难。可以说，对当时的人民海军建设来说，干部学好技术，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向干部反复讲清了这些道理，要求各级干部对自己的技术学习，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处理好工作和学习的矛盾，放下架子，以甘当小学生的姿态，积极投入到技术学习中去。同时各级都加强了对干部在职学习的领导，及时拟定学习计划，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我们还把技术学习成绩的好坏列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一来，干部的学习劲头也很快鼓起来了，涌现出了一大批迅速掌握了技术的舰艇长、飞行员和各类技术干部。干部学好了，战士学习也就更积极更有

成效了。

为了更好地掌握现代技术，中央军委于一九五一年底决定，一九五二年度的军队训练“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要。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海军政治部即制定了《海军部队文化教育实施计划》，明确指出：“两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作基础，虽然也能掌握一定的技术和业务，但如果想进一步精通技术和提高业务水平，则是困难的。只有提高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才能更好地掌握现代化的海军技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六月十五日，海军领导人共同签发了向文化和军事技术进军的《动员令》，进一步提出：“掌握技术，这是人民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迅速地提高全体人员的文化水平。”九月，海军党委又作出《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文化教育是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各级党委必须坚决地正确地执行这一方针。”“海军对文化科学的需要，一般较陆军为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用一年时间，而是要用三五年的时间。”

军委当时规定，军、政、文教育训练时间的比例安排是：文化教育占百分之五十，军事训练百分之三十，政治教育百分之二十。我们认为，就全军来说，这样规定是适当的。但根据当时海军的情况，不少干部战士生活在舰艇

上、工作在海岸炮上，但是不能驾驶舰艇、操纵火炮，部队形不成战斗力量，而当时的敌情又很紧张，战斗也比较频繁。学好文化固然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技术，但现实情况要求我们不能等文化都提高了，再来着手学习技术。因此，海军部队教育训练时间的比例，同陆军部队应有所区别。在坚持以文化教育为主的同时，不能放松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别是担负战斗任务的第一线部队，仍应以主要精力学好军事技术。在时间分配上，我们研究确定，舰艇和海岸炮兵部队，军训时间百分之五十，文化教育占百分之三十，政治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其他陆上部队和机关人员，则可按照军委的规定，文化教育时间占百分之五十。这样做，并不是不重视文化学习，而是结合海军的实际情况，从保证部队完成战斗任务的需要出发，来贯彻执行军委的规定。这一做法，得到了军委的同意。

这样，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一个学习文化、同时学习技术的热潮，在海军各部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全海军约有八万人以学习文化为主，三千多名知识青年担任了文化教员。在坚持在职学习为主的同时，各部队还开办了文化补习学校一百余所，文化速成中学和速成小学各六所。许多同志如渴思饮，刻苦学习。只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初小以下程度的人数比学习前减少了约二分之一，高小以上程度的人数则增加了一倍以上。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学好技

术业务创造了条件，也为进一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打下了初步基础。在这同时，舰艇、岸炮等主要战斗部队的技术学习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部队的技术水平继续有所提高。

在军事技术训练的组织领导和训练方法上，我们反复强调了要遵循一些正确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把部队的技术基础打牢。归纳起来，我们当时着重强调的是这样一些原则：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各项技术的训练都应该由简单到复杂、由白天到夜间、由良好天候到恶劣天候下去进行。各个科目的训练，都应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按一、二、三、四科目的顺序进行，从单兵的基本动作到战位、部门、全舰的协同动作，都要反复训练，达到动作熟练，运用自如。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尽可能采取实物教学的方法，多进行示范教育。学校教育决不可只重视学习理论，忽视实习。要少讲多做，边学边操练。一九五一年八月，朱德总司令在青岛参观炮兵学校，看到他们运用实物教学的方法时，就连声称赞：“这样的教学方法好，很实际，识字的不识字的都能学会。”三是既要发扬我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传统练兵方法，又要实行“按级教育，按级负责”。四是训练必须与海军的作战任务及日常的战斗活动相结合。例如，舰艇部队在港岸待命时，可多进行单人操作等基础科目训练；在航行中可多进行协同配合和航行训练；检修机械时则可结合学习

机械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等等。

当时，有些干部一面叫喊缺专业干部、缺技术人员，一面却又出现了将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任意改行、随便调动的现象。例如，把电工手改行去担任赶大车的运输员，把观通、轮机、水雷等技术人员改任书记、文教、会计，把炮长、炮手改任事务长、上士，等等。发现这一情况以后，我很生气，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反映了部队组织纪律观念不强，而且发展下去，势必削弱部队的技术基础，技术这根桩子就永远也打不牢。海军领导机关多次指示部队要纠正这种现象，但情况并没有迅速好转，而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一九五三年四月的粗略统计，已经改行的各种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竟达二百四十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应改行的。为了坚决煞住这股风，这年五月初，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禁止将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任意改行、随意调动的决定》。《决定》指出，这是一种“错误做法和有害倾向”，必须迅速纠正。同时再次提醒各级领导要从“思想上重视干部的专业化”，要“了解海军战斗力量建设的基本因素之一就是技术建设”，“没有大批掌握了专门技术的干部和人员就不可能把海军战斗力量建设起来”，“须知海军兵种繁多，技术复杂，学会技术不易”。《决定》要求“对某些违背领导机关的指示，擅自将学过专门技术的人员改行使用和降职使用的干部应给予必要的处分”，“对已经改了行的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作

一次清理”，将那些不应改行的技术人员“一律调回”，“按所学技术进行统一调配”。《决定》还要求“今后对各种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调动，必须做到严密的控制”，并对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动、改行的批准权限作了具体规定。通过贯彻落实海军党委的这一决定，海军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才基本上稳定下来。

经过三四年 的刻苦训练，部队技术素质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全海军经正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干部战士已达两三万人。这批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虽然与海军建设需要的差距仍然很大，但已成为当时海军各个部队的技术骨干，在海军建设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仅据一九五〇年底对舟山、青岛地区五十艘主要舰艇干部演变情况的统计，在一九五〇年时期，这些舰艇的部门长和正、副舰长中，原海军人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到一九五三年秋季，原海军人员仅占这些舰艇技术干部的百分之九还弱了，大部分舰艇长和部门长都由工农干部担任。就部队的训练水平来说，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例如舰艇部队，有的由原先离靠码头都很困难，已经提高到能在各种条件下进行小编队航行，实行对空、对海、对岸、对潜艇射击及施放烟幕或在近海单线布雷。飞行部队有的已可担任白天对敌舰艇投雷射击，进行海上中空布雷，对海上目标照像、侦察等任务。岸炮部队由原先打不响炮，普遍能对海上目标进行射击了。

在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我们一面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但在这同时，却也做了一些蠢事。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较多，在干部的分配使用上，过分强调阶级出身，强调历史清白，有的甚至搞唯成分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清理”、“泻肚子”，把很大一批掌握了专业技术，政治表现也不坏，只是由于出身不好，或个人历史上有某个问题以及思想作风有某些缺点的专业技术人员，处理离队了。这就不但浪费了国家培养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财，而且明显削弱了部队的专业技术队伍，对海军建设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内疚和惋惜。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再重复的。特别是在全国军民都在一心一意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今天，知识和人才是最可宝贵的财富，浪费人才是最大的浪费。只有特别重视培养和爱惜人才的人，才称得上是高明的领导者。